

※ 研究動態 ※

指南山下經師業，渡船頭邊百年功^{*} ——國立政治大學在臺復校初始階段 (1954-1982)的經學教育

車行健^{**}

一、序 言

民國四十三年(1954)六月九日，中華民國教育部長張其昀(1901-1985)向行政院長陳誠(1898-1965)提出「建設臺灣，光復大陸，必須儲備各項專才，而政治幹部，尤為復國建國之中堅份子，擬先在臺恢復設置國立政治大學，以應急需」的簽呈。經陳誠院長批示，提交行政院院會通過核准政大在臺復校，擇定臺北近郊指南山麓為校址，並成立籌備委員會。籌備委員會決議先恢復研究部，設行政、公民教育、新聞三研究所，後又增設國際關係研究所，十月正式招生。十一月二十日，陳大齊(1886-1983)奉命出任政大在臺復校後第一任校長。民國四十四年秋，增設大學部，設立教育、政治、新聞、外交、邊政五學系。與此同時，也將研究部原有之公民教育、行政、國際關係研究所之名稱，改為教育、政治和外交研究所，以求與有關學系名稱相符合。民國四十五年八月，大學部奉令增設中國文學、東方語文

本文原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於2016年7月14日主辦之「戰後臺灣經學研究(1945-現在)第三次學術研討會」。後又於2016年12月9日在政大中文系經常性學術討論會中宣讀，適逢政大中文系籌辦60周年系慶，系主任曾守正教授特將此場列為系慶講座，邀陳逢源教授為主持兼討論人。又此稿完成後，曾先後呈送李威熊、黃景進、董金裕及呂凱諸位前輩教授指正，教益良多，特誌於此，用申謝悃。

* 景美溪流經政大校園，溪畔古有渡船頭。

** 車行健，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和西洋語文三學系¹，是為政大中國文學系在臺創設之始²，首任系主任為高明(1909-1992)教授³。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奉教育部令，夜間部增設中文系與西洋語文學系各一班⁴。民國五十三年，復增設中國文學研究所，由熊公哲(1894-1990)教授兼代所主任⁵。民國五十八年中文系奉准招收雙班，而中文所亦奉准成立博士班⁶。至此政治大學中文系的系所結構完全成型，一甲子來，肩負著弘揚中華文化、傳承中文學術與培育臺灣中文人才的神聖使命，在教育、學術研究和社會參與等方面，貢獻卓著。

傳統國學可說是臺灣中文學門的核心，占據著中文學門教學與研究的極大比重。而在大學中文系（包含中國文學系、中國語文學系及師範系統的國文系）的實際教學中，居於四部之首的經學之相關課程（包含經書、經學整體和經學史），即

¹ 以上敘述參民國 44 學年度的《國立政治大學概況》（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55 年），頁 5，再次徵引同年分的《國立政治大學概況》時，以《概況（學年度）》方式標示，或徑簡稱《概況》，以省篇幅；民國 45 學年度的《國立政治大學概況》（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56 年），頁 5；《國立政治大學在臺復校校務發展概況資料彙編（初稿）》（以下簡稱《彙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校長室，1973 年），上冊，頁 1a-b；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編纂委員會編撰：《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稿》（以下簡稱《校史稿》）（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89 年），頁 217-218、220。案：陳大齊先是於民國 43 年 11 月 20 日奉命擔任政大代理校長，直至民國 44 年 4 月 1 日才被正式任命為政大校長。見〈本校六十年大事紀要〉，《校史稿》，頁 561-562。

² 政大在臺復校後的中文系究竟是「創立」還是「恢復」？這是頗耐人尋味的問題。政大中文系網頁中的「系所簡介」明確地寫道：「本系創立於民國四十五年，招生大學部新生一班，由高明先生擔任首屆系主任。」（<http://www.chinese.nccu.edu.tw/introduction/pages.php?ID=demo101>）如此算來，成立已逾一甲子了。然而早在民國 35 年 8 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常會決議將中央政治學校與中央幹部學校合併，改制為國立政治大學，歸入國家教育體系後，當時為因應改制，即已新增設有中文系，研究部亦設有文史哲學研究所。這個階段一直延續至民國 38 年，政大隨國民政府播遷至西南，最終參與川西戰役為止（參《校史稿》，頁 203-204）。如此，則政大中文系的系史應是從民國 35 年開始，至今當已有 70 年的歷史。其實在民國 62 年出版的《彙編》中，其中關於中文系概況即已明言：「本系在大陸期間，即已創設，畢業學生計十有九期。民國四十三年，本校在台復校，越三年，即恢復本系。首由教授高明先生任系主任。」（上冊，頁 139a）可見在當時的認知中，仍是持「恢復」而非「創立」的概念。因此，政大中文系應是隨著政大在臺復校而重新「恢復」，且高明也並非「首屆」系主任。

³ 《校史稿》，頁 220。

⁴ 同前註，頁 265。

⁵ 同前註，頁 267。

⁶ 同前註，頁 269。

使不能在數量上呈現四部之首的重要性，但仍然占有一席之地。相對於久已廢棄，但近年來頗思恢復的中國大陸中文系（或由中文系擴大升格的文學院）及其他相關系所學院（如部分高校的歷史系、哲學系、古籍所，以及近年紛紛設立的國學院和與孔子或儒學有關的學院、研究院等），保留傳統經學而不替的臺灣高校中文系，無疑與之形成一極有意義的對比，對大陸高校的經學教育產生了燈塔般的效應。臺灣高校中文系重視經學（以及與經學關係密切的小學）的課程架構與理念，實是延續著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臺前的民國學術傳統，這個現象正好印證了楊儒賓所謂「這一甲子的臺灣學術可以說是民國學術的延伸」之觀察⁷。然而，臺灣高校中文系的經學教育之內涵為何？其課程結構、施教成果如何？其整體的特色又為何？欲對這些問題做有效的回答，須建立在較完整且全面考察與研究之基礎上，目前條件似乎尚未成熟。不過，若對已有六十年歷史，且系所結構完整，辦學成效卓著的政大中文系之經學教育的施行做些回顧性的考察，或許可以對上述問題的解決提供一些前行研究式的參考。

本文對政大中文系經學教育的研究對象，包括施教者（師資）、施教內容（課程）及施教對象（學生）等三個面向。在施教者方面，主要是涉及到教授經學的師資；施教內容則是以經學相關課程，包含通論性的經學概論、經學史，或斷代及專題式的經學課程及經學專書等為主要考察對象；施教對象則將重點放在指導教授對研究生的學位論文之指導及實際表現方面。研究的範圍則以第一代學人之教學與辦學活動為主，考察與經學相關的第一代專任教師，在系所創設的早期階段所奠定的基礎與規模，主要包括高明、熊公哲與王夢鷗（1907-2002）這三位先生⁸。因此本文

⁷ 楊儒賓：《1949 禮讚》（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5 年），頁 171。

⁸ 龔鵬程在〈年輕一代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文中嘗謂：「以社會科學界的研究來說，最早到臺灣來的第一批，算是第一代學者。」（見氏著：《經典與現代生活》〔臺北：新未來出版社，1989 年〕，頁 181）。以這個標準來看，高明、熊公哲、王夢鷗三先生無疑是政大經學領域的第一代學人；而受業於此三先生且曾長期任教政大中文系的呂凱、李威熊、李振興、簡宗梧與董金裕等諸先生則為第二代學人；目前任教政大中文系且師承於第二代學人者，如劉又銘、陳逢源、陳睿宏等人當為第三代學人。龔鵬程觀察臺灣的古典文學的研究，認為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代是林尹（1910-1983）、高明、潘重規（1908-2003）、臺靜農（1902-1990）、鄭騫（1906-1991）和李辰冬（1907-1983）等渡海來臺的諸先生，直接延續大陸學風，在臺灣傳播文學研究的種籽。第二代則是如王熙元（1935-1996）、于大成（1934-2001）、黃永武、羅宗濤、吳宏一等人，直接受業於來臺的大老。龔鵬程這輩的學人，係第二代學人的學生輩，應屬第三代學人，而第三代的學生輩則

的斷限就從政大在臺復校的民國四十三年起始，直至高明於民國七十一年自政大退休為止⁹，首尾共二十八年，而這段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時期，也正是政大在臺復校最重要的奠基肇始階段。撫今追昔，述往思來，或許可讓吾人對經學在臺灣的持續傳承與未來發展，有更多切合於歷史經驗與現實情境的省察¹⁰。

二、經學相關課程實施概況：科目與任課教師

政大在臺復校後的經學教育，主要由中文系（包括夜間部）與中文所碩博士班所承擔，雖然中文系所之外的其他系所，也曾開設過與儒學或經書相關的課程，如最早創立的政治研究所和教育研究所皆開設過「孔子思想研究」、「孟子思想研

已是第四代了（同前書，頁181；又見氏撰：〈學會運作概況〉，《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頁363。相關討論亦可見楊晉龍：〈張以仁先生與臺灣傳統學術研究：以學位論文為對象的考徵〉，《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5卷第4期〔2015年12月〕，頁138-140）。若以古典文學領域學人的傳承情況來衡量經學或其他領域學人的傳承，則不免都會有些參差不齊的地方。這種學人世代參差不齊的現象是很常見的，蓋由於學者從年輕到晚年，一生教書的時間很長，授業弟子也有早年與中晚年之分。且現代大學體制，學生不須拜入門下即可自由選課，所以世代與世代之間的界限往往就會變得很模糊，於是就會發生同輩學人甲師承第一代學人，而乙則師承第二或第三代學人，致使二者輩分不相侔的情況。甚至亦有同一人在碩士階段由第二或第三代學人指導，博士論文則由第一代大老指導的現象。所以在看待學人世代的問題時，師承關係、求學時間與實際年齡固然皆是須加以考量的因素，但三者又並非絕對的，中間仍存在不小的彈性空間。

⁹ 據高明於民國64年所作的〈自述〉謂：「今年，余滿六十五歲，依新大學法之規定，已屆退休年齡，不能再兼公立大學學術行政職務；……曉峯先生聞余之將退休也，遂錫以『華岡教授』之名。」（見氏著：《高明文輯》〔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下冊，頁699、701）。然據游淑靜所編〈高明教授年表〉，卻記載高明於民國71年退休（見氏撰：〈他編了第一套國文教科書——訪高明教授〉，《國文天地》第11期〔1986年4月〕，頁15）。兩相比對可知，高明於〈自述〉中自謂其於民國64年66歲時，已屆退休年齡，故依新大學法規定，「不能再兼公立大學學術行政職務」，但他直至73歲時，方才真正自政大退休。又案：三人中以熊公哲最年長，王夢鷗次之，高明最幼。王夢鷗於民國68年自政大退休（參林明德：〈涵蓋古今中外的學人——王夢鷗教授〉，《文訊雜誌》2002年10月號，頁90；《文論說部居泰山——王夢鷗教授》〔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頁1）。因而高明於民國71年在政大的退休，當可視為一個時代的結束。

¹⁰ 蒙呂凱教授提醒，盧元駿（1911-1977）教授亦應與三先生並列研究。其實第一代學人亦多有經學背景，盧元駿外，祁述祖、張立齋、馬小梅等人亦皆有其成就和貢獻，然因囿於篇幅和作者的疏漏，無法於本文中詳論，當俟他文為之。

究」的課程¹¹。此外，政治所還曾另開有「儒家政治思想」，教育所亦曾另開設「孔孟思想研究」¹²。成立於民國五十八年的哲學系，則曾開設過「孔孟荀哲學」與「易經哲學」等課程¹³。但一來，這些系所所開設的與儒學或經書相關的課程，其教授的方向不必然是「經學的」取向；二來，這些課程的穩定度亦不夠，並沒有持久開設下去，如民國五十六年度的《國立政治大學概況》（以下簡稱《概況》）所載的政治研究所的科目表中，雖曾載有「孔子思想研究」、「孟子思想研究」與「儒家政治思想」這三門課程，且前二者還被列為必修課¹⁴，但在五十九年度的《概況》所載的政研所科目表中，這三門課就與「中國政治思想史」一塊被併入到「中國政治思想研究」和「中國近代政治思想研究」這兩門選修課，且學分數從總共十學分大幅縮減至四學分¹⁵。此後在可寓目的《概況》及今日政治系的課程中，皆未見有這三門課。教育所的情況亦類似，在五十一、五十二、五十四和五十六年度的《概況》所載的課表中，雖列有「孔子思想研究」、「孟子思想研究」二門課¹⁶，但在五十九年度《概況》中的課表則只見「孔孟思想研究」，而不見「孔子思想研究」、「孟子思想研究」，疑是將此二門課併為一門課¹⁷。但在六十六年度的《概況》中的科目表

¹¹ 如民國 49 學年度的《國立政治大學概況》（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60 年）載政治研究所高級研究生必修科目表和政治研究所科目表中均有「孔子思想研究」2 學分的課程（頁 21、23）。民國 51 學年度的《國立政治大學概況》（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62 年）則在政治研究所高級研究生必修科目表、政治研究所科目表和教育研究所科目表中均列有「孔子思想研究」和「孟子思想研究」2 學分的課程（頁 31-33）。民國 52、54、56 學年度的《國立政治大學概況》（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63、1965、1967 年）亦同（分別見頁 32-34、頁 41-42、頁 43-44）。

¹² 《概況（56）》所載的政治研究所科目表除「孔子思想研究」和「孟子思想研究」外，尚見有「儒家政治思想」2 學分的課程（頁 44-45）。而在民國 59 學年度的《國立政治大學概況》（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70 年）所載的教育研究所科目表中，不見分列的「孔子思想研究」和「孟子思想研究」，只見「孔孟思想研究」2 學分的課程（頁 43）。民國 61 學年度的《國立政治大學概況》（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72 年）亦同（頁 43）。

¹³ 《概況（59）、（61）》所載的哲學系科目配置表中均見有「孔孟荀哲學」必修 4 學分（皆見頁 71）。民國 66 學年度的《國立政治大學概況》（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77 年）所載的哲學系科目表不見「孔孟荀哲學」，似以「先秦儒家哲學」代之。然另見有「易經哲學」選修 3 學分（頁 73-74）。民國 69 學年度的《國立政治大學概況》（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80 年）亦同（頁 77-78）。

¹⁴ 參見註 11。

¹⁵ 《概況（59）》，頁 44。

¹⁶ 參見註 10。

¹⁷ 參見註 11。

中，則渾不見孔孟的蹤影，取而代之的是「中國教育思想研究」之類的課程¹⁸。可見，與儒學或經書相關的課程，並非政治所與教育所的長期發展方向。早年之所以有這方面的課程，合理的推測應該還是與復校初期第一代學人的辦學理念與學術專長有關，而陳大齊應是其中較具關鍵性的人物¹⁹。隨著第一代學人的凋零，本就深受西方學術主宰的政治與教育學門，其課程逐漸淡化傳統中國學術的色彩，也是自然的趨勢²⁰。哲學系雖仍保有相關課程，但其方向與理念亦是哲學，而非傳統經學。因此，在政大校園內傳授經學相關課程之重責大任，乃理所當然地由以傳承傳統學術為使命的中文系全盤承擔起來。

然而，今日若欲對政大在臺復校頭二十八年的課程，做一全面詳細地回顧與檢視，首先，須依賴完整的原始課程檔案，如：每學期與每學年的課程科目表、課程大綱、課程說明或課程手冊等。今日所能掌握的課程資料並不是很完整，科目表

¹⁸ 見《概況(66)》，頁22-23；《概況(69)》所載亦同（頁26-27）。案：雖在民國77年的《概況》可見教育所博士班有「中國儒家教育思想專題」選修2-4學分的課，碩士班亦有「儒家教育思想」選修2學分的課（頁33、35），但檢視今日教育系網頁，無論系所課程和教師專長領域，皆已不見有和儒學孔孟相關的痕跡。

¹⁹ 陳大齊自民國49年起即擔任政治研究所的專任教授，直至56年退休。在49、50、51、54和56學年度的《概況》中，均見其列名政治所的專任教授，開設課程有「因明學研究」（《概況(49)》，頁9）、「孟子思想研究」（《概況(50)》，頁11；《概況(51)》，頁13；《概況(52)》，頁13；《概況(56)》，頁24）、「孔孟學說研究」（《概況(54)》，頁23；《概況(56)》，頁24）。此外，在民國51年出版的《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明概覽》和53年出版的《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明》皆在政治研究所的課程中載有「孔子思想研究」和「孟子思想研究」的完整課程說明，授課教師當為陳大齊（見〈政治研究所課程說明〉，《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明概覽》〔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62年〕，頁6b；〈政治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明》〔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64年〕，頁2-3）。

²⁰ 從這個現象可以看出，在深受傳統學術與文化薰陶的第一代學人心目中，傳統經學或儒學還是具有相當開物成務與參天化育的功能和價值，因而可持之與從西方傳入的政治學和教育學等社會科學相對話，甚至從中開發中國傳統的學術資源，並試圖建構立基於中國傳統學術與文化土壤中的政治學理與教育學理。他們的理念是否可行，努力是否成功，姑且不論，但至少他們積極地將經學儒學與現代西方社會科學進行對話，賦予經學儒學更多的時代能量，而非只圈禁在傳統學術或所謂國學的牢籠中，這種企圖與視野是值得肯定的。但自此之後，傳統經學儒學逐漸淡出這些社會科學體國經野的視域中，回到文學院獨見南山的孤芳自賞中，任憑其自開自謝，皆無與於社會的脈動與時代的變遷。然而這究竟是經學的損失，還是這些社會科學的損失，抑或是兩敗俱傷？今日重溫前輩學人當年架構這些課程的理想，令人不勝感慨。

主要見於歷年編印的《概況》中，裏面載有各系所詳細的科目表，包括課名（科目）、學分數、必選修、修業年級及相關規定等資訊。此外，又列有各系所任課教師的名單，包括姓名字號、職級、專兼任及任課科目等。因此，從中就可獲得一較全面的課程實施概況。但今日政治大學圖書館及校史室留存的《概況》並不完全，僅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四、五十六、五十九、六十一、六十六和六十九年度的，缺了四十六、四十七、五十三、五十五、五十七、五十八、六十、六十二至六十五、六十七、六十八、七十和七十一年度的，因此無法將這二十八年的課程做一地毯式的全面整理與編年式的詳盡考察。至於對課程內容做進一步說明介紹的課程大綱，或課程說明等資料，目前能掌握到的也僅有民國五十一年出版的《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明概覽》和五十三年出版的《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明》。此外，民國六十二年出版的《國立政治大學在臺復校校務發展概況資料彙編（初稿）》（以下簡稱《彙編》）提供了各系所與課程及師資截至六十二學年度相關的資料，亦可資參考。以下就利用這些並不完整的材料，嘗試將政大中文系所在復校肇始階段的經學相關課程，做一鳥瞰式的回顧。由於夜間部的課程內容不出中文系的規模，故以下敘述從略。

中文系經學課程，主要是以經學專書的方式來授課的，這些專書包括傳統的《五經》，即《易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以及《論語》、《孟子》這二部儒家重要的經典，總共七部經典。但此七部經典在整體課程結構中的重要性卻並不相同，「論語」、「孟子」、「毛詩」和「禮記」是必修課，「周易」、「尚書」為選修課；「左傳」則頗有變化，剛開始是列在必修，後又改為選修，並不固定。在中文系創始的四十五學年，全系僅有八門課時，當時即已設有「孟子」四學分的課，任課教師為熊公哲²¹。可以說，「孟子」是政大經學教育的開端。在此後可見的課程資料中，「孟子」一直持續開設下去，且被列為中文系一年級的必修科目，學分數亦由一開始的上下學期二學分，到五十一年時調為上下學期三學分。而在五十六年的《概況》中，則改列在中文系選修科目表中，學分數為六，但備註欄註明為「部定必修」。在五十九年的《概況》中，又回復到上下學期二學分的必修課，六十一年和六十六年《概況》所記亦同。教授「孟子」的教師除熊公哲（45、48、51、52 學年）外，尚有張立齋（49 學年）、祁述祖（50、54、56、59、61 學

²¹ 《概況 (45)》，頁 17。

年)、馬小梅(50、51、52 學年)、華仲馨(51、52 學年)、應裕康(51 學年)、張相(52 學年)和王先漢(59 學年)等教師²²。

「論語」的情況與「孟子」相類似,在四十八、四十九年的《概況》中,被列為二年級的必修科目,亦為上下學期二學分,均由熊公哲講授,五十一年調為上下學期三學分。在五十六年的《概況》中,改列在中文系選修科目表中,學分數為六,但備註欄註明為「部定必修」。在五十九年的《概況》中,又回復到上下學期二學分,六十一年和六十六年《概況》所記亦同。其他講授此課的教師有張立齋(50、51、52、54 學年)、潘光晟(51、52 學年)、韋日春(54 學年)、馬小梅(59、61 學年)²³。

「禮記」在四十八年度的《概況》中,見列於三年級的必修課中,由王夢鷗講授。學分數一開始是上下學期二學分,直至五十六學年才改為上下學期三學分,但此時卻由必修改為必選。五十九年的《概況》將其列為必修,但學分卻調為上下學期二學分,六十一年和六十六年《概況》所記亦同。授課教師除王夢鷗外,尚可見有馬小梅(54 學年)²⁴。

「毛詩」在四十八年度《概況》見列於四年級上下二學分的必修課,但四十九學年卻改為上下學期三學分,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四年俱同。五十六學年改為必選,五十九年的《概況》改列為上下學期二學分的必修課,六十一年和六十六年的《概況》所記亦同。授課教師有祁述祖(49、50、51、52、54、56、59、61 學年)、賴炎元(1930-1995)(54 學年)²⁵。

²² 《概況(48)》,頁29、107;《概況(49)》,頁10、30;《概況(50)》,頁12、35;《概況(51)》,頁14-15、38;《概況(52)》,頁14、39;《概況(54)》,頁24、52;《概況(56)》,頁26、57;《概況(59)》,頁26、58;《概況(61)》,頁28、58;《概況(66)》,頁51。

²³ 《概況(48)》,頁29、107;《概況(49)》,頁10、30;《概況(50)》,頁12、35;《概況(51)》,頁14、38;《概況(52)》,頁14、39;《概況(54)》,頁24-25、52;《概況(56)》,頁57;《概況(59)》,頁26、58;《概況(61)》,頁28、58;《概況(66)》,頁51。

²⁴ 《概況(48)》,頁29、107;《概況(49)》,頁10、30;《概況(50)》,頁12、35;《概況(51)》,頁14、38;《概況(52)》,頁14、39;《概況(54)》,頁24、52;《概況(56)》,頁57;《概況(59)》,頁58;《概況(61)》,頁58;《概況(66)》,頁51。

²⁵ 《概況(48)》,頁29;《概況(49)》,頁10、30;《概況(50)》,頁12、35;《概況(51)》,頁14、38;《概況(52)》,頁14、39;《概況(54)》,頁24-25、52;《概況(56)》,頁26、57;《概況(59)》,頁26、58;《概況(61)》,頁28、58;《概況(66)》,頁51。

「左傳」在四十八年度《概況》見列於四年級上下二學分的必修課，但四十九學年卻改為上下學期三學分，五十年亦同。但五十一年改列為與「楚辭」、「老莊選讀」和「新文藝習作」等四科中必選一科的情況，惟學分數仍為六學分，五十二年亦同。五十四、五十六學年仍為選修六學分，五十九年的《概況》改列為上下學期二學分的選修課，六十一年和六十六年《概況》所記亦同，惟未清楚標示修課年級。授課教師有傅隸樸（49、50 學年）、程發軔（1894-1975）（52 學年）、盧元駿（54、56 學年）、馬小梅（54 學年）、劉太希（1899-1989）（59、61 學年）²⁶。

「周易」和「尚書」從在四十八年度《概況》見列於四年級上下二學分的選修課始，一直都是選修。但五十六年度的《概況》卻未見列於科目表中，五十九年度的課表又重新見到，調整為四年級上下二學分的選修課，六十一年和六十六年《概況》所記亦同，惟未清楚標示修課年級。曾擔任「周易」的教師僅在六十一年度的《概況》中見有兼任教授章斗航。曾擔任「尚書」的教師則無記載²⁷。

政大中文系經學課程僅以經書教授的授課方式，嚴格說來，並不能算是政大中文系經學教育的特色。因為這七部儒家經籍的教授在教育部於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十二日頒行、三十三年八月修訂、同年九月二十七日公布的《修訂大學文理法師範各學院分系必修及選修科目表》中，就被列為中國文學系必修科目中的五類「專書選讀」的經典類，經典類中所規定的書目正是《論語》、《孟子》、《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和《春秋左氏傳》（附《國語》）²⁸。這個做法大體一直延續至民國六十年初的第六次大學課程修訂²⁹。而大約也在這個時代，政大中文系的經學

²⁶ 《概況(48)》，頁29；《概況(49)》，頁10、30；《概況(50)》，頁12、35；《概況(51)》，頁39；《概況(52)》，頁14、40；《概況(54)》，頁24、53；《概況(56)》，頁26、57；《概況(59)》，頁26、59；《概況(61)》，頁28、59；《概況(66)》，頁52。

²⁷ 《概況(48)》，頁30；《概況(49)》，頁31；《概況(50)》，頁36；《概況(51)》，頁39；《概況(52)》，頁40；《概況(54)》，頁53；《概況(56)》，頁56-58；《概況(59)》，頁59；《概況(61)》，頁28、59；《概況(66)》，頁52。

²⁸ 《修訂大學科目表》（臺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55年重印），頁74、78-80。案：「專書選讀」中規定的五類為經典、諸子、史籍（諸史）、文翰及文史評（同前書，頁79-80）。

²⁹ 民國44年重印的《修訂大學科目表》、47年編印的《修訂大學科目表》、54年初版、59年再版的《修訂大學科目表》皆大致相同（分見《修訂大學科目表》，頁6；《修訂大學科目表》〔臺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58年〕，頁10-11；《修訂大學科目表》〔臺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70年再版〕，頁4-5）。反映第六次大學課程修訂精神的《修訂大學課程報告書》則於必修課中的「專書選讀」將《四書》和五類專書分開。且規定《四書》「或單開《論語》、《孟子》、《大

課程開始有了不一樣的做法。在六十六年《概況》中的中文系科目表中，經學課程除專書七經外，尚增加了「學庸選讀」和通論性質的「經學概論」，均為選修四學分的課³⁰。六十九年《概況》又略加調整，將「論語」、「孟子」和「學庸選讀」合併為「四書」；「經學概論」改稱作「經學通論」³¹。由於缺了六十二至六十五年間的《概況》，因而無法確切查考此二課程出現在中文系科目表中的實際學年，且六十六年度的《概況》亦不載有教師任教科目的資訊，因而也不容易知悉此二科目的授課教師由何人擔任。「經學概論」的課程在政大中文系的課表中出現，其最大的意義是在大學部的教育中，「重新」重視作為整體的經學，而非只是作為專書選讀的經典或經書；也可以說，至此階段，在大學部的教育中才真正有以經學為完整主體的經學課程，而非僅止於儒家經典的課程³²。

中文研究所在民國五十三年開辦，五十四年的《概況》記載與經學相關的課程有：「孔孟學說研究」、「經學史」和「爾雅研究」，皆為必修，四學分。五十六年《概況》所記與經學相關課程則為「孔孟學說」（必修，4 學分）、「經學史」（與「周秦諸子」二科必選一科）、「詩經研究」、「爾雅研究」等選修課（2-4 學分）。民國五十八年成立博士班，但五十九年《概況》所列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科目，卻沒有專門經學的課，碩士班科目則有「經學史」（必修，4 學分）、「孔孟學說」（選修，4 學分）、「詩經研究」（選修，2-4 學分）、「經學專書研究」（分「周易研究」、「尚書研究」、「春秋研究」……，選修，2-4 學分）、「爾雅研究」（選修，2-4

學》、《中庸》其中一至二種」（《修訂大學課程報告書》〔臺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73 年〕，頁 33-34）。

³⁰ 見《概況（66）》，頁 52。

³¹ 見《概況（69）》，頁 56-57。

³² 在 1949 年之前的中國大陸高校中文系中，本多設有經學概論（或通論）及經學史的課程，但自 1930 年代之後，似有呈現江河日下，無以為繼之勢。錢穆（1895-1990）以為是他為文批判康有為（1858-1927）所代表的今文經學學風所致。鄙意這種影響固然存在，但應不足以會對這類課程的存續帶來根本性的撼動。問題還是要從經學這門學問在當時學術、教育和社會日益受到漠視的整體處境來看，而教育部於 1938 年開始推動的大學課程及設備標準化的工作，所進行的課程之整理修訂，應更是從制度面上給予以經學為整體和主體的課程之徹底地釜底抽薪。試想，既被一般學界和社會視為不合時宜的落伍學問，且又失去制度性的保障，幾何不為大學高校相關科系所排斥或遺忘？因而，儒家經典的教授方是數十年來高校中文系經學教育的主流，這個狀況自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相關討論參拙著：〈現代中國大學中的經學課程〉，《現代學術視域中的民國經學——以課程、學風與機制為主要觀照點》（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1 年），頁 5-40。

學分)。六十一年《概況》所記與五十九年略同。六十六年《概況》所見課程仍有「經學史」(必修, 4 學分)、「孔孟學說」(選修, 4 學分)、「詩經研究」(選修, 2-4 學分)和「爾雅研究」(選修, 2-4 學分), 但已不見「經學專書研究」, 而改分別為「周易研究」、「尚書研究」、「春秋研究」和「三禮研究」(皆為選修, 2-4 學分)³³。負責教授這些科目的教師, 目前從民國六十二年出版的《彙編》中所載, 僅可查考如下: 高明曾教授「周易研究」、「尚書研究」、「爾雅研究」等科目, 熊公哲曾教授「經學史」、「孔孟學說」和「詩經研究」。又, 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的胡自逢(1912-2004)教授亦曾於高明出國講學期間, 代理其原有課程³⁴。

整體來說, 政大中文系所的經學課程包含經書類的《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及《三禮》、《左傳》及《春秋》、《論語》、《孟子》與《爾雅》之講授, 和通論類的「經學概論」與「經學史」, 尚未見專題與斷代經學史(如現有的「兩漢經學」)的課程, 專家課程則亦僅有「孔孟學說研究」。課程的多樣化和專精化顯然在當時還不太時興。任課師資除熊公哲、高明和王夢鷗創系三元老外, 尚有傅隸樸、程發軔、華仲馨、潘光晟、張立齋、祁述祖、馬小梅、盧元駿、張相、王先漢、胡自逢、應裕康、韋日春、賴炎元、劉太希和章斗航等專兼任教師。其中, 馬小梅曾教授過「孟子」、「論語」、「禮記」和「左傳」這四門課程, 角色顯得頗為吃重。張立齋和祁述祖也各曾教授過兩門課程(前者是「孟子」和「論語」, 後者是「孟子」和「毛詩」)。

此外, 政大中文所當時存在著濃厚的小學和文獻學的學風, 若只單從經學課程本身來看, 這個特色並不容易察覺出來, 但若把小學領域和文獻領域的課程放在一起來看的話, 這個學風就很容易呈現出來了。事實上, 其時的經學課程在中研所整體的課程結構中, 無論是課程數量和所占比重都並沒有十分突顯, 反倒是小學和文獻領域的課程, 才是中文所的重頭戲。以五十六年的課程來說, 中文所的科目表中共有三十二門課(不一定皆有開出), 寬泛認定的經學課程只有「孔孟學說」、「經學史」、「詩經研究」和「爾雅研究」等四門, 但小學課程則有「說文研究」、「甲骨學」、「金石學」、「漢簡文字」、「廣韻研究」、「等韻研究」、「語言學概要」等

³³ 《概況(54)》, 頁 47; 《概況(56)》, 頁 50-51; 《概況(59)》, 頁 48-49; 《概況(61)》, 頁 48-49; 《概況(66)》, 頁 30-31。

³⁴ 《彙編》, 上冊, 頁 70b、71a; 又, 熊公哲在 56、59 和 61 學年《概況》所載教師任課科目中有列「經學史」和「詩經研究」(分別見頁 26、頁 23 和頁 25)。

七門；文獻領域的則有「目錄學」、「版本學」、「校讎學」三門課，再加上小學和文獻色彩濃厚的「治學方法概要」，這些課全部加起來有十五門課，占所有課程的46%，將近一半。若只單獨計算小學和文獻的課程，則原有小學的七門課還要加上「爾雅研究」一門，共十二門，也有37%的分量。這種「盛況」在今日臺灣的中文研究所是再難看到的。五十九年度的情況略同，但又更變本加厲，在全部的三十三門課中，經學、小學和文獻的課程共有十九門，更高達57%，其中小學領域又增開「方言研究」、「俗文字學」，文獻領域甚至開出了「辨偽學」、「輯佚學」的課程³⁵，小學和文獻學所形成的古籍文獻考據學風，儼然成了政大中文所的最大特色，經學在其中倒反成了陪襯。但或應如此看：即從傳統治經的角度來看，二者實際上都是研治經學的輔助性及工具性學問，只不過是延續清代乾嘉考據學的學風。固然這些工具性的學問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附庸蔚成大國」，逐漸形成獨立性的學問；但這種治學方法和風格，仍然深刻地影響著研治經學的方向。因此，當時政大中文所排出的課表，看上去雖似是眾多的小學和文獻學領域的課程分別獨立開設，但實又扮演著夾輔經學課程的作用，猶如周代封建諸侯之於周天子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下，經學學風朝文獻考據的方向傾斜，應也是極自然的發展趨勢。因此，經學、小學和文獻學三者似應放在一起看待，三者共同體現出當時中文研究所重視文獻考證的主流學風。研治經學須重視小學和文獻學，而不少小學和文獻學的課程實際上仍是與經學相關，經學和小學、文獻學，或是猶如一體的兩面（經學與小學、經學與文獻學），或時亦表現出三位一體的關係³⁶。

附帶一提的是，政大中文所曾於民國六十一年與國立中央圖書館合作，招收目錄學組碩士研究生五名³⁷。但這個目錄學組卻宛如曇花一現，只招收了兩屆十名左右

³⁵ 《概況(56)》，頁49-51；《概況(59)》，頁48-49。

³⁶ 以筆者粗略的觀察，現今臺灣撰寫經學領域的論文，相較其他領域，更多地表現出重視文獻考察與運用的傾向，以字詞訓釋為主的小學，所扮演的輔助性或支援性的功能反而並不明顯。由此或可見戴震(1724-1777)所倡，最能體現乾嘉考據學治經精神的所謂「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之「訓詁明則古經明」的訴求，似頗不適應於今日臺灣研治經學之學風。

³⁷ 《彙編》，上冊，頁68a。關於設立目錄學組的背景，據已故的喬衍琯(1929-2012)教授敘述，蓋因民國46年，時任教育部長的張其昀有鑒於圖書、博物館人才缺乏，因而在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國文研究所增設圖書館等組，除修習學科外，並在中央圖書館實習。然僅辦一期，招生六人。民國61、62年，因圖書館高級館員端賴留學生歸國服務，而留學生歸國意願不高，再加上國內設圖書館研究所的條件尚未成熟，因援前例，於政大中文所增設目錄學組，惟不再實習（以上見喬

的學生³⁸，就停辦未再賡續下去，甚為可惜。但從當時課表來看，與文獻學有關的課程依然充實，直至民國七十年代底，除辨偽學外，目錄學、校讎學、板本學、輯佚學、文獻學、四庫學等，均曾定期輪開³⁹。但時移世易，今日與文獻相關的課程在政大中文系所，卻幾乎已杳無蹤跡，系所學風陵夷之快速與劇烈，令人吃驚。

三、經學課程施教內容舉隅

政大校方曾於民國四十九年秋天開始研議編製課程說明書，但因課程種類繁多，各方撰擬先後不一，所以遲至民國五十三年，都仍未告竣。因而在五十一年時，為適應各方需要，並且依照第四次校務會議決議，將已收到的課程說明，先行油印，以供運用參考，於是編輯成《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明概覽》。又於五十三年加以打字排印，編印成《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明》⁴⁰。就中文系的部分，二者內容大體相同，只不過一為油印，一為打字排印。於其中體現了中文系在臺恢復設置後頭幾年的課程講授綱要。但類似的課程說明在後來很長的時間似都未再編印，直到民國七十六年，方由各學系編製課程手冊⁴¹。但之後似也未見繼續這樣的工作。隨著電腦網路化的普及，編製紙本的「課程說明」或「課程手冊」已成絕響。

《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明》編製時，中文所尚未成立，而民國七十六年的《課程手冊》則只有中文系的課程說明，且亦超出本文的時間範限，因而只能從有限的

衍琯：〈政治大學設圖書館系芻議〉，《古籍整理自選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頁248）。

³⁸ 喬衍琯在〈培育板本鑑定人才〉文中提及「共招兩屆十一人」，但在〈政治大學設圖書館系芻議〉中又說是「兩年共招生約十人」，以每屆招收研究生五名來看，似當以後說為是。二文均收錄於氏撰：《古籍整理自選集》，分見頁241、248。

³⁹ 此據喬衍琯〈政治大學設圖書館系芻議〉一文所述（頁250）。喬氏此文原刊載於1990年8月出刊的《中華學苑》第40期，當能反映民國70年代後期的教學實況。

⁴⁰ 參《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明概覽》之〈課程說明書例言〉；《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明》之〈課程說明書例言〉。

⁴¹ 中文系的《課程手冊》，由政大中文系編印，出版於民國76年元月，由其「編輯凡例」可知，該手冊係依75學年度開設課程編定，編寫的體例則為：「每一課程分『旨趣與目標』、『內容與進度』、『授課方式與指定作業』、『教科書』、『重要參考書』及『其他』等項，由該課程任課教師撰文介紹之。」（頁1）比早年的《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明》更加規範化。此《課程手冊》由劉又銘教授借覽，特申謝忱於此。

材料中，對政大早期曾經施行過的大學部經學課程施教內容，略做一舉隅式之泛覽概觀。今僅見「孟子」、「論語」、「禮記」、「毛詩」和「左傳」五種經學科目之課程說明，「周易」和「尚書」則不見收錄，只得付之闕如。以下依次從必修選修與修業年級的順序，將經學相關課程之課程綱要加以引錄。

(一)「孟子」，大一必修，上下學期六學分。

孟子之志，在學孔子，戰國時諸侯放恣，邪說橫行。孟子毅然以中國道統自任，排斥楊墨，宣揚儒教，使孔子之道，永垂於後世，故言中國文化者，莫不孔孟並稱。自南宋朱子將《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合為《四書》，以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一貫之道統。於是《孟子》一書，更為學者所尊崇。今日研究《孟子》，不僅讀其章句，尤須明其義理。孟子在政治方面：提倡仁義，反對功利；提倡王道，反對霸道；提倡和平，反對戰爭；提倡民主，反對專制。在教育方面，提倡孔學，反對異端；提倡性善，反對義外；提倡養氣，反對小勇；提倡自得，反對助長。其思想之博大精深，雖傳至二十世紀之今日，亦大可採取，以救世之急。故歐美學者，對於孔孟學說，頗多崇拜。而我全國上下，亦知精神文明之重要。觀最近孔孟學會之組織，可見學術思潮之轉變矣。

(一) 選授〈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等七篇中之精要各章。

(二) 宏揚孟子之思想、學說。簡述如下：I 孟子之中心思想：性善主義。

II 孟子之人生觀：1. 服務人生觀；2. 排斥功利之人生觀。III 孟子之教育論：

1. 原則——順其本性，自動自發；2. 方法——存心養性，寡欲有恒；3. 信條——端正趨向，堅強意志。IV 孟子之政治主張：1. 民貴主義；2. 保民政策；3. 賢能政府；4. 法治精神。⁴²

(二)「論語」，大二必修，上下學期六學分。

《論語》一經，辛亥以前為讀書之士必讀之書，為不讀書之人皆知之書；辛

⁴² 〈文學院中國文學系課程說明〉，《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明概覽》，頁 5a-b；《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明》，頁中 - 9、10。

亥以後，廢經，公家廢，而私人不輟。五四新潮起，文學革命作，於是《論語》之書，乃由必讀之書，一變而為不屑一顧之作。然鄉曲開發，猶有吟哦而習知之者，再後邪說暴行，暗長潛派，數千載私家傳授之風泯，均公家所不倡者乃漸絕，甚烈於漢武之黜百家，而同工於秦政之坑儒士，舉國風靡，習俗漸野，《論語》一書，蓋關係極重也。近大學課程雖有《論語》一科，〔固僅二時，〕業限一載，其能收效至於何種程度乎？況此書如儒家之金科，草草竟之，是雖設而等於無，故愚意〔宜定《論語》為必修之外，且延長其修業期間，〕凡中文系學生不熟讀而精曉者不得畢業，一方監其品行，佐以分數而後準其及格，若是其庶幾乎。⁴³

（三）「禮記選讀」，大三必修，上下學期四學分。

本課程以選讀《小戴禮記》為主，講授大要如下：（一）示範研讀，著重訓詁考證；（二）課外指導，參考書評選。⁴⁴

（四）「毛詩」，大四必修，上下學期六學分。

《詩》有興觀群怨之效，感人深切。故治中國文學者，首須熟讀三百篇，陶冶其性情，培養其志氣，以奠定文藝創作之基礎。例如〈六月〉、〈采芑〉、〈車攻〉、〈崧高〉、〈烝民〉、〈江漢〉、〈常武〉諸詩，可以啟發青年之民族思想；〈瞻卬〉、〈召旻〉、〈節南山〉、〈正月〉、〈大東〉、〈北山〉諸詩，可以啟發青年之民權思想；〈碩鼠〉、〈伐檀〉、〈葛屨〉、〈苕之華〉、〈杕杜〉諸詩，可以啟發青年之民生思想。不但此也，讀〈凱風〉、〈蓼莪〉，當知孝於父母；讀〈小戎〉、〈無衣〉，當知忠於國家。必若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而後可與言《詩》也。茲為配合教學時數，選授八十篇如左：一、〈國風〉五十篇：1.〈周南〉四篇：〈關雎〉、〈卷耳〉、〈漢廣〉、〈汝墳〉；2.〈召南〉四篇：〈鵲巢〉、〈行露〉、〈小星〉、〈何彼穠矣〉；3.〈邶風〉四篇：〈柏舟〉、〈凱風〉、〈谷風〉、〈北門〉；4.〈鄘風〉三篇：〈桑

⁴³ 同前註，頁 8b；同前註，頁中 - 15、16。方括號內文字為《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明概覽》有，而《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明》刪除的文字，下同此。

⁴⁴ 同前註，頁 9a；同前註，頁中 - 16。

中》、《相鼠》、《載馳》；5.《衛風》三篇：《碩人》、《氓》、《伯兮》；6.《王風》三篇：《黍離》、《兔爰》、《葛藟》；7.《鄭風》四篇：《蘄兮》、《褰裳》、《揚之水》、《溱洧》；8.《齊風》二篇：《雞鳴》、《敝笱》；9.《魏風》五篇：《葛屨》、《園有桃》、《陟岵》、《伐檀》、《碩鼠》；10.《唐風》二篇：《鴇羽》、《葛生》；11.《秦風》四篇：《小戎》、《黃鳥》、《晨風》、《無衣》；12.《陳風》三篇：《宛丘》、《衡門》、《墓門》；13.《檜風》二篇：《隰有萇楚》、《匪風》；14.《曹風》三篇：《蜉蝣》、《鴟鵂》、《下泉》；15.《豳風》三篇：《七月》、《鸛鳴》、《東山》。

二、《小雅》十五篇：《鹿鳴》、《常棣》、《采芣》、《六月》、《采芣》、《車攻》、《吉日》、《小弁》、《蓼莪》、《大東》、《北山》、《都人士》、《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

三、《大雅》十五篇：《文王》、《大明》、《緜》、《皇矣》、《生民》、《公劉》、《民勞》、《板》、《蕩》、《崧高》、《烝民》、《江漢》、《常武》、《瞻卬》、《召旻》。⁴⁵

（五）「左傳」，大四選修，上下學期六學分。

《左傳》，一名《左氏春秋》，或曰《春秋左氏傳》，傳家之義與列傳之傳有異，而同於注釋，所謂《左傳》者，即《春秋》左氏注釋之省稱也。《春秋》一經，為孔子撥亂反正之工具，亦為其政治思想之結晶，唯其文微，其旨遠，而史實又多不相屬，末儒嘗有斷爛朝報之譏，其得以流傳不泯者，全賴左氏之傳之推挽。左丘明世為魯史官，習於掌故，《春秋經》之底本即為魯史資料多出其助，故得接聞夫子之微言大義。其釋經也，雖亦重單辭隻字之筆削，而尤要在史實紀述之詳贍。讀其傳，則經中人物之肺肝如見，經中事理之黑白自分，有羚羊掛角，不著形迹之妙。然此特就其解經之功而言耳；其在解經之外，實兼具中國文化史之用，如樂舞之制，章服之度，民族之源流，名字之意義，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官銜〔之〕沿革，曆算之系統，婚娶之俗，宴會之禮，星相之術，醫卜之技，無不標綱絜領，賅舉無遺，如登崑岡而窺瑤府；如之帝所而聞廣樂，使人耳目不給焉。至其所載當

⁴⁵ 同前註，頁 6a-b；同前註，頁中 - 11、12。

時國際交涉慣例，前國立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氏曾撮舉其符合近代國際法者編為《古代國際法》一書，流布中外，蓋其不僅有徵於古，亦有驗於今也。

若夫文辭爛然，為文章不祧之祖，猶其餘技耳。⁴⁶

這五個科目的課程說明皆未註明撰者的姓名，只能從負責授課的教師中去推測。在民國五十一年以前教授「孟子」者除熊公哲外，尚有張立齋、祁述祖和馬小梅，但熊公哲講授此課最早，次數也較多，此課程說明出自他手筆的可能性還是最大。熊公哲講授「論語」的情況雖類似「孟子」，但「論語」的課程說明風格與「孟子」大不相同，並無具體講授的計畫，只在強調《論語》的重要，語多憤慨，不敢斷然確定為熊公哲所撰。查張立齋曾在五十、五十一、五十二等學年講授「論語」，此課程說明或亦有可能出自其手。「禮記」長期由王夢鷗講授，此課程說明當可確定由其執筆。祁述祖曾在四十九、五十、五十一等學年負責教授「毛詩」，則「毛詩」之課程說明應是由其負責撰寫。傅隸樸則在四十九、五十學年間任「左傳」之授課教師，「左傳」之課程說明由其撰寫的可能性當亦不低。

這五個經學科目的課程說明，除「禮記」外，大體都很詳盡。惟涉於具體講授內容者，只有「孟子」和「毛詩」，「論語」和「左傳」比較偏重在對該書的內容和價值加以闡述。且從「孟子」、「毛詩」和「左傳」三科之課程說明中可以看到，執筆者（當亦為其時該科目之授課者）不但嘗試將經書之內涵理董出一有機之系統（如「孟子」、「毛詩」），或闡發其豐富的價值（如「左傳」），更重要且讓他們心心念念的是，如何將經書之義理智慧運用至現今之社會，或發掘其現代之意義，使其為現代人所用。故而《孟子》之思想「傳至二十世紀之今日，亦可採取，以救世之急」，讀《毛詩》可以啟發青年之民族、民權與民生思想，甚至讀《左傳》可以既徵於古又驗於今，顯見當時講授經學之教師固善於運用通經致用之教也。

四、系所課程規畫與相關規定

民國六十二年出版的《彙編》對中文系的成立宗旨及發展方向有詳盡的闡述，其云：

⁴⁶ 同前註，頁 10a-b；同前註，頁中 - 18、19。

本系乃以發揚我國固有學術與培植中國文學人才為宗旨，故所開設之課程，向以古典文學為主，而以現代文學為輔，庶使學生在國文方面之修養，能新舊相融，古今參合，以達成本系設立之目的，此其一。本系對於學生之研習，理論與寫作並重，期能同時養成其欣賞與創作能力，如聲韻學、文字學則須常作筆記。如歷代文選、詩選、詞選、曲選、小說選等則須經常寫作，教師尤樂於精細批改，俾使學生獲致實益，此其二。本系為配合時代之需求，對學生外文之培養，特加顧及。故本系開有大二英文、大三英文，以及即將增設之日文等選修科目，至於所開之文藝概論，則尤著重中西文藝之比較研究，俾使學生具有多種語文能力與學識，以適應未來之需要，此其三。此外，為增進學生之學識，對學生課外閱讀，包括在校與寒假時期，作有計劃之規定，並制定測驗辦法，庶使與正課配合發展，以增益其學業，此其四。⁴⁷

《彙編》中關於中文系的成立宗旨與發展方向的文字敘述，在《國立政治大學概況》中也可見到，然而遲至六十一年度的《概況》，皆僅有系所課程科目的展列，並無系所概況的說明，直至現今可見及的六十六、六十九及七十七年度的《概況》，方有關於系所設立宗旨與發展方向之說明。而從中可看到，《彙編》所載中文系的辦學理念，大體上一直延續保留下來，沒有太大的改變⁴⁸。

至於中文所的辦學理念，《彙編》中並沒有太多著墨，相關敘述亦僅見於六十六、六十九及七十七年度的《概況》，其云：

本所設立宗旨，在培養研究我國文學專門人才，發揚中國文化之人文精神，促進文化復興，喚醒民族靈魂、建立民族自信，以研究中國人文科學之成果，貢獻於復國建國工作，並謀全人類福祉。分設碩士班與博士班，碩士班教學重在基礎之奠立，方法之傳授及專長之培養；博士班教學重在基礎之加厚，視野之擴大及術業之專精。⁴⁹

在上述關於中文系所設立宗旨和辦學理念的自我回顧和定位中，並沒有太突出經學教育的色彩，反倒是文學和語言文字學的部分，有被著意強調。其實這也不難理

⁴⁷ 《彙編》，上冊，頁 139b-140a。

⁴⁸ 《概況 (66)》，頁 50；《概況 (69)》，頁 55；《概況 (77)》，頁 52。

⁴⁹ 《概況 (66)》，頁 29；《概況 (69)》，頁 33-34；《概況 (77)》，頁 39。

解，因為在現代中文系和中文學門的形成過程中，文學（古典、現代）和語言文字學（即傳統的小學）本就是最核心的領域。經書和經學的課程，或者依附隸屬於文學或語言文字學，如《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稿》即如此描述在民國四十年代復校初期時的中文系之教學特色：

在古典文學方面，有「國學概論」、「孟子」、「史記」、「左傳」等典籍導讀，計有十餘門，是為該系教學的重點。⁵⁰

又或者隸屬文學和語言文字學之外的其他關於中國文化或國學的領域（如義理，現今政大中文系將經學相關課程皆歸屬於義理領域）。中文所強調「發揚中國文化之人文精神」、「研究中國人文科學之成果」，打破一般中文系或中文學門所謂文學、小學、文獻、義理等領域區分的方式，而以整體之「中國文化之人文精神」、「中國人文科學」為研治重點，似乎更能對應中國傳統學術渾淪一體之特色，其中居於四部之首的經學，或因此較能突顯其價值與意義。

此外，中文研究所施行的點書規定，亦頗能彰顯其對經學教育的重視，《彙編》述此曰：

本所於規定課程之外，為奠定研究生治學基礎，並定博士研究生須將《十三經注疏》圈點一遍，餘則閱讀唐晏《兩漢三國學案》、黃宗羲《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徐世昌《清儒學案》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分別作禮〔謹案：當作札〕記。碩士研究生須圈點國學要籍八部，如《論語》、《孟子》、《荀子》、《禮記》、《毛詩》、《昭明文選》、《說文解字》及《左傳》、《史記》等。《論語》、《孟子》、《禮記》、《毛詩》、《左傳》皆用注疏本、《荀子》用王先謙集解本、《昭明文選》用李善注本、《說文解字》用段玉裁注本、《史記》用裴〔謹案：當作裴〕駟、司馬貞、張守節三家注本。⁵¹

規定圈點的古籍以經籍及經學相關者為重，由此所呈現出的對經學之重視，遠超乎表現在中文所實際開設的經學課程之數量及學分數⁵²。但嚴格來說，類似的點書規定

⁵⁰ 《校史稿》，頁 235。

⁵¹ 《彙編》，上冊，頁 70a-70b。

⁵² 政大中文系目前仍舊保留圈讀古籍的制度，並為此制定「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博士班學生古籍圈讀書目及考核辦法」，圈讀的書目除《十三經注疏》外，還包括系上開列的書目：《戰國策》、《國語》、《史記》、《漢書》、《後漢書》、《老子》、《莊子》（二者合為一部）、《管子》、《荀子》、《墨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世說新語》、《宋元學案》、《明儒學

在臺灣大多數中文所的教育中，皆曾普遍施行很長久的時間，並不能算是政大的特色⁵³。

政大中文系所的理念與課程規畫究竟是由誰所主導的呢？就中文系的部分，《校史稿》明確地說道：

中文系在大陸時期即已創設，民國四十五年，在本校恢復設置，首由高明教授擔任系主任，主持編訂課程，延聘教師等工作。⁵⁴

《彙編》說得更清楚：

民國四十三年，本校在台復校，越三年，即恢復本系。首由教授高明先生任系主任，編訂課程，延攬教師。規畫既定，遂於四十五年夏招收一年級學生一班，九月開學，大體就緒。高主任復從而釐定各項規章，充實圖書設備，筆路藍縷，丕啟規模，其後每年招收一年級新生一班，至四十八年夏，遂完成四年建制。⁵⁵

可知高明在中文系初創時期，主導中文系的系務與課程規畫。但四十八年八月，高

案》、《清儒學案》、《楚辭》、《昭明文選》、《文心雕龍》。規定碩士班學生須圈讀《十三經注疏》中的大經一部或小經（《論語》、《孟子》、《孝經》、《爾雅》）二部，與系上開列書目中的一部。博士班學生須圈讀《十三經注疏》中的大經二部與系上開列書目中的一部。圈讀《十三經注疏》時，應圈讀本文及古注；圈讀《十三經注疏》以外書目時，則應全書句讀（見政大中文系網頁之「課程資訊」中「碩士部修業規定」與「博士部修業規定」）。

⁵³ 古籍圈點制度的推行，可說構成了臺灣中文人的普遍記憶，輔仁大學中文系更將圈點的規定提前至大學部一年級施行。在「大一必修上下學期各2學分的「史記」課中，修課學生須將《史記》全書（通常仍以本紀、世家與列傳為主）圈點完畢，並經授課老師的檢查或考核。但這種記憶對許多人來說，卻似乎變成夢魘般的存在。龔鵬程就曾對此有許多尖刻的批評，如其云：「點書，本是好事。然凡好事，成了規矩就惹人厭。譬如吃飯，自是美事，人也不能不吃飯。但是若規定必須吃、不准不吃、而且有幾樣菜非吃不可，那胃口可就倒盡了。」（見氏撰：《四十自述》〔臺北：印刻出版公司，2002年〕，頁139）不過龔鵬程這種觀感，對早年曾就讀於臺師大國文研究所的朱守亮教授而言，卻有完全不同的認知，他在民國49年9月4日的日記中記道：「雖也有人反對圈點書；但經驗告訴我，功夫沒白費，應是作學問最笨、最基礎的訓練。經此訓練，我敢說，現在任何沒有句讀的書或文章給我，我都可斷開句子後，再探尋其真正涵意，這是無此訓練的人所不能做到的。讀書真的要『笨』，要『下基本苦功夫』，沒甚麼方法技巧！但誰能瞭解到這些？」（氏撰：《心靈深處：亦園齋主人日記摘要》〔臺北：知識系統出版公司，2010年〕，下冊，頁1221）。關於古籍圈點的相關討論又見註82。

⁵⁴ 《校史稿》，頁235。

⁵⁵ 《彙編》，上冊，頁139a。

明榮聘政大教務長，系主任便改由熊公哲接任⁵⁶。熊公哲繼任後，系務續有開展，《彙編》說道：

熊主任復鑒於政府倡行國民教育，今後國民中學師資必感缺乏，為備將來需要，因建議將本系成立雙班制，五十八年秋，開始招收一年級學生兩班，於是本系規模，益見擴充，而教學內容、研習精神，亦愈充沛。⁵⁷

民國五十八年秋天，熊公哲因年齡限制，奉准辭去中文系主任之職，復由擔任中文所主任的高明兼任。直至六十一年，高明因赴新加坡南洋大學講學，辭去系主任兼職，改由盧元駿接任⁵⁸。總計高明共擔任六年中文系主任，熊公哲亦擔任十年主任的職務，二人合計主持系務長達十六年，中文系的系務規畫與課程安排應皆主要是在他們任上完成的。或許可做如此論斷：精研傳統經學的熊、高二先生，聯手擘畫了政大中文系的經學教育，而政大中文系的經學教育也自然深深烙上了二人學問的印記⁵⁹。

中文所的部分，則是初成立時，熊公哲的貢獻較大，《彙編》有云：

民國五十三年，本所成立，先設碩士班，每年招收碩士研究生十名；五十八年，增設博士班，每年招收博士研究生三名；六十一年，本所與國立中央圖

⁵⁶ 《校史稿》，頁 235。

⁵⁷ 《彙編》，上冊，頁 139a。

⁵⁸ 同前註，頁 139a-b。

⁵⁹ 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高明（或所謂「高師仲華」）幾乎就等同於政大中文系的招牌，看到高明就使人聯想到政大中文系，反之亦然，這完全是因為他在政大及整個臺灣中文學界所散發出的影響力所使然。當然，這也不可避免地會給他帶來一些負面的評語與閒話。如著名的政治犯雷震（1897-1979）與高明頗有來往，在他的日記中就曾寫到一則來自政大內部不利於高明的閒話，其謂：「下午三時去政大，李易均謂高明要造派系，政大研究所畢業生不給他們教課，反請師大研究所畢業生來教課，政大研究生甚不滿。」（氏著：《雷震日記（1959-1960）》，收入《雷震全集》〔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 年〕，第 40 冊，頁 182）。雷震此則日記是記於 1959 年 10 月 26 日，當時政大中文系連畢業生都沒有，更遑論中文所畢業生。雷震日記提到的政大研究所畢業生，當是政大在臺復校最早成立的教育、政治、外交與新聞研究所的畢業生，截至 48 學年度，這四所的研究生共畢業一二六人，結業五人（《概況（49）》，頁 67）。這些無法在政大教課的政大研究生，將不滿的矛頭針對擔任教務長的高明，若他們希望教授的是國文之類的課程，則他們並無此專業或學歷；若是國文之外的課，則又事關各領域的專業屬性，亦並非高明所能完全主導。由此或可推知，很多類似的批評與攻訐，未必都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上，多半只是一些情緒的發洩與立場的表達。

書館合作，招收目錄學組碩士研究生五名。初成立時，所主任由當時本校中國文學系主任熊公哲先生兼代，籌備擘劃，開創的功勞最大。⁶⁰

廖作琦〈我所知國學大師——熊公哲〉更有如此描述：

一九五四年政治大學在臺復校，先後創設中國文學系及中國文學研究所，公哲姻伯曾為此致力催生。尤其對中國文學研究所的設立，更竭盡所能奔走呼號，〔甚至上書最高當局，在所不惜，〕終獲有關部門核准，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勞。其後任該所首任所長，並任中文系主任達十年之久，對於所務及系務之策畫推行，更是殫精竭慮，時常為之寢食俱廢。⁶¹

不過熊公哲只是兼代，當時政大校長劉季洪（1904-1989）似屬意由高明擔任所主任之職。然高明於民國四十九年擔任政大教務長兼文學院院長任內，應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之聘，任高級講師兼系主任。民國五十三年返臺後，復應張其昀之聘，擔任中國文化學院中文系主任及中國文學研究所所長。政大中文所成立後，據高明自述，劉校長「以所長一職懸以待余二年」⁶²。因此，他在得到張其昀的諒解後，於民國五十五年時返回政大擔任中文所主任，直至民國六十四年因屆齡而自行政職務上退下來為止，中間只有在民國六十一年時因赴新加坡講學一年，由王夢鷗兼代⁶³。因此，中文所也與中文系一樣，其所務規畫和課程安排皆主要由熊、高二人主導。

然而，同屬中文系所創立元老⁶⁴，且與高明和熊公哲同為「政校舊人」的王夢

⁶⁰ 《彙編》，上冊，頁 68a。

⁶¹ 原文載於《傳記文學》第 72 卷第 1 期（1998 年 1 月），頁 109。此文經熊公哲嗣熊琬教授補充，刊載於果庭書院網站：http://blog.xuite.net/guoting_academy/GTA/124819637。方括號內「甚至上書最高當局，在所不惜」的文字，即為熊琬所補充。

⁶² 以上參高明：〈自述〉，《高明文輯》，下冊，頁 698-699；〈自序〉，《高明文輯》，上冊，頁 1；董金裕：〈高仲華師的待人與處事〉，《高明教授百歲冥誕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2009 年），頁 3。然董文將高明赴港講學之事，記為民國 45 年，當屬筆誤。

⁶³ 《彙編》，上冊，頁 68a。

⁶⁴ 三人中，熊公哲最早進入在臺復校後的國立政治大學服務，他於政大復校後的隔年（民國 44 年 8 月）即獲聘兼任教授，與成惕軒（1911-1989）、梁容若（1904-1997）、杜學知（1913-?）、丁宣孝（1896-?）等人共同擔任教育、政治、外交、新聞、邊政等五系之國文課程（《概況（44）》，頁 10、34）當於中文系成立後的次年轉任專任教授。高明則是於民國 45 年，以陳大齊之禮聘，從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國文系，轉來政大創辦中文系（高明：〈自述〉，《高明文輯》，下冊，頁 698）。王夢鷗亦於民國 45 年離開中央研究院，專任政大中文系教授（參林明德：〈涵蓋古今中外的學人——王夢鷗教授〉，頁 90；《文論說部居泰山——王夢鷗教授》，頁 1）。

鷗⁶⁵，在當中的角色為何？頗令人好奇。事實上，王夢鷗雖未擔任系主任，但卻曾兩度兼代中文所主任。除民國六十一年高明赴南洋講學，兼代一年外，民國五十四年，中文所創立的第二年，由於熊公哲免兼中文所主任，而專任中文系主任，高明又遠赴香港講學，在劉季洪校長虛位以待高明歸來的尷尬時期，便暫由王夢鷗兼代一年⁶⁶。王夢鷗雖兼代此職，但並非拱手垂裳，於所務與課程規畫無所措意於其間，山東省圖書館和魚臺縣政協編的《屈萬里書信集·紀念文集》收錄一通王夢鷗寫給屈萬里(1907-1979)的信函，其中有如下的內容：

拜誦十月十二日惠書，遠辱勛勉，感奮何如！政大中文研究所本似為應景而設，師資設備，兩難充實，如弟駑鈍，謬承其乏，深以賊人子弟為懼。今年先生應聘遠行，末由叨教，幸獲林岷先生惠允兼授專業，使諸生略知治學門徑。然欲盡變冬烘積習，尚有待先生榮旋，賜以大力挽回也。……弟王夢鷗敬上。十月十八日。⁶⁷

該函當寫於民國五十四年十月十八日，然整理者卻誤繫於「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劉兆祐編撰的《屈萬里先生年譜》亦襲此誤⁶⁸。王夢鷗寫此函的主要目的，就在於向當時人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擔任高深研究所研究員，協助整理普大圖書館中文善本圖書的屈萬里，請託改善政大中文所的師資課程；其實很有可能就是想延攬屈萬里至政大中文所任教。二人具體的通信背景應是：王夢鷗於該年甫接掌成立年餘的政大中文研究所所務，亟思改善該所師資，遂於當年致函屈萬里，請求協助。屈萬里赴美後，心中仍掛念此事，遂於十月十二日覆函王夢鷗，對其加以勉勵。王夢鷗旋即於十八日再度去函屈萬里，此即該封王夢鷗去函屈萬里之信札⁶⁹。王夢鷗請

⁶⁵ 「政校舊人」語見高明：〈自述〉，《高明文輯》，下冊，頁698。據其〈自述〉云，其於民國29年，應陳果夫(1892-1951)之召，至重慶小溫泉中央政治學校任秘書。一年後，張道藩(1897-1968)繼陳果夫任政校教育長，以其兼通新舊文學，聘授國文。其時授國文者，尚有黃淬伯(1899-1970)、徐澄宇（即徐英，1902-1980）、穆濟波(1889?-1976)、蘇淵雷(1908-1995)、熊公哲與王夢鷗諸人（頁695）。王夢鷗亦曾自述：「民國三十年於重慶的政大，曾和高明先生來往。」（林明德：《文論說部居泰山——王夢鷗教授》，頁4）。

⁶⁶ 《彙編》，上冊，頁68a。

⁶⁷ 山東省圖書館、魚臺縣政協編：《屈萬里書信集·紀念文集》（濟南：齊魯書社，2002年），頁167。案：函中提及之林岷當為林尹。

⁶⁸ 劉兆祐：《屈萬里先生年譜》（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1年），頁244。

⁶⁹ 關於此函之相關考釋，請參拙著：《〈屈萬里書信集〉所收王夢鷗函札的繫年問題》，《國文天地》

託屈萬里改善政大中文所師資之原函及屈先生之覆函今均未得見，實際內容不能得知，然從之後的結果可知，屈萬里從未曾在政大兼過課，政大中文所的師資課程，似也看不出有屈萬里協助改善的痕跡。其間的細節緣由今皆不易考知，然王夢鷗努力改善中文所的師資課程之努力，固亦不可抹滅也⁷⁰。

五、與經學相關之學位論文指導

政大在臺復校肇始階段，經學教育的成效與特色，還能從中文所研究生的學位論文之指導與撰寫中體現出來。在這個階段，熊公哲、高明與王夢鷗這三位創系元老幾可說是主宰了碩博士班研究生的學位論文指導，而攸關經學領域者，更主要是由熊公哲與高明二老所負責。由附錄「熊公哲、高明與王夢鷗指導碩博士生學位論文一覽表」中可以清楚的看出⁷¹，從民國五十五年有碩士研究生畢業開始，一直到民國八十二年王夢鷗指導的最後一位研究生畢業為止，熊公哲一共指導了三十二位研究生，其中碩士二十二位，博士十位。與經學有關者有十三位，這當中政大的研究生有十位，餘三人為外校研究生。這十位從事經學研究的研究生有六位為碩士生，

第 31 卷第 7 期（2015 年 12 月），頁 79-81。

⁷⁰ 關於王夢鷗兼代政大中文所主任期間推動所務的作為，黃景進教授在審閱本文初稿後，曾提供若干珍貴的回憶，可與本文所述相互印證及補充。黃教授的回憶由其高足政大中文系的陳英傑教授執筆記錄下來，以〈黃景進教授對王夢鷗先生兼代政大中文所主任的回憶〉為題，刊於《國文天地》第 32 卷第 7 期（2016 年 12 月）。其中提及王夢鷗教授曾以大約每月一次的高頻率，邀請國內外重量級學者蒞所進行學術講演，除屈萬里外，尚包括中央研究院的黃彰健（1919-2009）教授、臺灣大學的臺靜農（1902-1990）教授、臺灣師範大學的許世瑛（1910-1972）教授，以及日本的御手洗勝（1924-2009）教授（頁 66）。黃景進教授的回憶頗可補充本文所不足，但同時也印證了王夢鷗在致屈萬里的函札中所念茲在茲的，希望藉由屈萬里的幫助來改善政大中文所的教學環境，實非客套的應酬虛語，而是確有其真誠的教學體會，與來自現實上的焦慮感受。

⁷¹ 本表蒐錄資料來源包括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網站、政大中文系製作的「研究生歷年畢業目錄」（掛載於政大中文系網頁之「學生資訊」中）和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編製的「臺灣師大國文學系歷年博碩士論文目錄」（掛載於臺師大國文系網頁之「研究資訊」中）。然其中間仍有錯漏，且於論文名稱、指導教授、畢業系所和畢業年分等資訊亦皆時有不一致之處，仍須以原始紙本論文所載為準。凡本表所列者，皆盡可能查核原始紙本論文。查核原始紙本論文的工作，承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生許偉軒、碩士生倫凱琪與臺灣大學中文系博士生盧啟聰等三位同學協助，謹誌於此，以申謝忱。

四位為博士生。高明則共指導了一一八位研究生，其中碩士四十七位，博士七十一位。與經學有關者計三十九位，與政大有關者僅有十一位⁷²。這當中有四位為碩士生，七位則為博士生，餘皆為外校研究生，甚至有香港新亞研究所的學生。王夢鷗雖指導了四十位研究生，其中碩士二十二位，博士十八位，但幾乎皆無與於經學，稍微與經學有些關聯者，僅有博士生李時銘一位，而李時銘也是王夢鷗在政大指導的唯一與經學相關的研究生。將三人指導的從事經學研究的政大碩博士生相加，共計二十二位。但因為當時常有合掛指導教授的現象，博士班尤其如此。這二十二位研究生中共有四位是熊公哲和高明二人聯合指導的博士生，將重覆的數目扣除後，僅餘十八位。而這十八位又有二位是碩士班和博士班皆撰寫經學領域題目，且又為熊公哲或高明所指導者（程南洲和李威熊），再將這個數字扣掉，則三人在四分之一世紀中所培養出的政大經學人才，總共只有十六位。

截至七十一學年度止，政大中文所碩士班共畢業了一七五位研究生，博士班則畢業了三十二位研究生，共計二〇七位研究生⁷³，三先生所培養的經學人才於其中所占的比重似乎不算太高，碩博士生合計共十六人次（除去聯合指導者，碩士共 10 人，博士共 6 人）。即使再將三位生先以外，其他教授指導的研究生全都算進來的

⁷² 高明在民國 64 年所作的〈自述〉謂：「溯自民國三十三年兼任西北大學系主任迄今，適滿三十年。此三十年中，歷教中外各大學，經余陶鑄而得博士學位者二十餘人、得碩士學位者三百餘人、得學士學位者不計其數。」（頁 699-670）然其所述與「一覽表」所載者相差甚遠，在「一覽表」中，其指導之博士有七十一位，非僅二十餘人。又「一覽表」僅見有四十七位碩士生，與其自述之三百餘人，差距尤其巨大，不知何故？或疑其所云受其陶鑄之三百餘位碩士生，非全然為其指導之學生，授業生及參與碩士論文口試之研究生可能皆包括在內。然觀其指導博士竟達七十一位，其中國家文學博士亦有五十位（至民國 72 年停授），真不愧有「國家（文學）博士之父」之譽（龔鵬程：《四十自述》，頁 133）。案：高明〈自述〉云其主持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時，教育部長張其昀：「欲提高我中國之學術水準，促進我中國之學術獨立，建立博士制度，指定浦薛鳳博士所主持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及余所主持之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招收博士研究生。……是為現代中國有博士教育之始。」（頁 698）

⁷³ 據「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生歷年畢業目錄」統計而得，此數據與《概況 (77)》所附的「國立政治大學各研究所歷年畢業學生人數統計表」略有不同，該表所載截至 71 學年度畢業的碩士生同是一七五位，但博士生則僅有二十六位。蓋「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生歷年畢業目錄」於研究生姓名、論文題目、指導教授及畢業年分皆詳加記載，當有極高的可信度，今暫以該目錄所統計出的數字為準。

話（共 17 位碩士生，1 位博士生⁷⁴），則從事經學研究的碩士生計二十七位，博士生七位，共有三十四位，於整體畢業的二〇七位碩博士研究生中，只占 16.4%。這個數據恰好可以和第二節所觀察的五十六年度中文所經學課程（4 科）在全部課程（32 科）的 12.5% 比重相對照。二者所反映出的訊息皆是：無論從課程數量或研究生撰寫論文的方向來看，經學都不能稱得上是熱門或強勢的領域。

但與課程設置相類似的是，早已由附庸蔚成大國的小學領域，在當時卻展現極顯著的影響力。事實上，當時有不少的論文正是界於經學與小學之間，如施炳華的《毛傳釋例》、程南洲的《經傳釋詞辨例》、蔡主賓的《敦煌寫本儒家經籍異文考》、方俊吉的《廣雅疏證釋例》、簡宗梧的《經典釋文徐邈音之研究》和李威熊的《經典釋文引說文攷》。除施炳華和程南洲二人之碩士論文為熊公哲指導外，其餘皆為高明指導。與此同時，高明在政大指導的小學領域論文多達十九篇（碩士 15 篇，博士 4 篇），比其指導的經學領域的論文還多（這當中包括上述界於經學和小學之間者）。這個情況正好印證了龔鵬程的觀察：

在我之前，中文系尚沉浸於兩大系統中：一為臺大及中研院系統，上附胡適、顧頡剛、傅斯年之考證辨偽學，如屈萬里先生《古籍導讀》所代表者，即為此派之治學方法。另一派則為林尹、高明諸先生所主持之師大、政大系統，上附於章太炎、黃侃，而實以小學為主，謂訓詁明而後義理明。⁷⁵

他對這兩個系統都有極尖銳的批評，尤其後者學風更為其就讀於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時耳目常所接聞者，故時有一針見血之評論，如其云：

⁷⁴ 碩士生包括盧元駿指導的李崇遠《春秋三傳傳禮異同考要》(1967)；祁述祖指導的周浩治《清代之詩經學》(1970)；潘光晟指導的顧健民《孟子趙注與朱注之比較研究》(1978)；胡自逢指導的古國順《清代尚書著述考》(1975)和黃忠慎《尚書洪範研究》(1980)；周何指導的梁春華《廣雅考》(1975)、方炫琛《春秋左傳劉歆偽作竄亂辨疑》(1979)和倪天蕙《宋儒春秋尊王思想研究》(1981)；朱守亮指導的鍾洪武《詩經中有關男女情感問題之探討與分析》(1978)和王春謀《朱熹詩集傳「淫詩」說之研究》(1980)；羅宗濤指導的張雙英《周禮所表現之社會觀》(1978)；劉兆祐指導的孔建國《文獻通考經籍考研究》(1975)；韋日春指導的關龍庭《大小戴記與荀子關係之探索》(1976)和伍安娜《孔孟之道述義》(1977)；董金裕指導的陳美圓《張載之禮學》(1980)；李威熊指導的陳熾彬《汪容甫學述》(1981)和呂凱指導的劉瀚平《東漢儒學與東漢風格》(1981)等十七篇碩士論文。博士論文則為周何、李威熊指導的方炫琛《左傳人物名號研究》(1982)，共一篇博士論文。

⁷⁵ 龔鵬程：《四十自述》，頁 35。

由於林老師（謹案：林尹）長期主持所務，他與高仲華師均出蘄春黃氏門下，由文字聲韻之學以上溯於清代樸學統緒，似乎就成了師大國研所的標記。即或並不鑽研此道，小學也被解釋為萬學之本、必由之徑。⁷⁶

類似的批評，也可見於臺灣當代學人對中文系學風的描述，如周志文在其散文中回憶道：

師大學術的主流向來標榜「小學」，舉例而言，所長林尹，就是文字聲韻學專家，又自稱是章黃的傳人，章太炎是寧信《說文》不信甲骨的，因此師大這一系統的文字學，一切理論都得建立在《說文》上面，與《說文》相異的說法，都被視為野狐外道。其實章黃的學術視野也不算小，「小學」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文字學上的某些偏見無損於他們在其他方面的貢獻，但師大視「小學」為學問的核心，又緊抱章黃的偏見不放，則無法避免有抱殘守缺之譏了。⁷⁷

由此或可對當時政大中文所的課程設置和研究生論文研究方向朝小學領域發展有一基本的了解。但政大畢竟不是臺師大的分支，同樣身為黃門弟子的高明和林尹，其學術表現也不必然全盤相同。在強調由文字聲韻上溯清代樸學的統緒時，高明亦展現出他對經學本身的尊重和學術眼光，如其於〈中華學術的體系〉一文中雖亦強調「考求文字的學術是研究一切學術的入門的學術」，但他亦承認「中華學術的思想主流，是寄寓在『經學』裏面的」⁷⁸。而從其有系統地指導學生從事鄭玄（127-200）經學的研究中，更可看出他的經學規畫，如他在民國五十八年為胡自逢的《周易鄭氏學》寫的序中即如此說道：

余少從先師蘄春黃季剛先生侃問學，先生告以治小學經學必由許鄭，余以是寢饋於許鄭之書者數十年，雖愚者時有一得，丁時喪亂，奔走四方，未遑悉書以問世。偶作〈許慎生平行跡考〉、〈鄭玄學案〉等文，不過初啟其端，略發其凡而已。然與諸生講學，則時時道之。諸生之俊彥者往往有所會心，欲因其說而分別精研之，以補余闕。於是賴生炎元撰《毛詩鄭氏箋釋例》，

⁷⁶ 同前註，頁 135。

⁷⁷ 周志文：〈初進臺大〉，《記憶之塔》（臺北：印刻出版公司，2010 年），頁 150。這段話又見於〈華仲馨先生〉一文，收錄於氏撰：《有的記得，有的忘了》（臺北：印刻出版公司，2016 年），頁 218。

⁷⁸ 高明：〈中華學術的體系〉，《高明文輯》，上冊，頁 66、67。

而鄭氏之《詩》學明；李生雲光撰《三禮鄭氏學發凡》，而鄭氏之《禮》學明；今自逢撰《周易鄭氏學》，而鄭氏之《易》學又明。清儒之治鄭學者，固莫之能過也。他日儻有步賴、李、胡三博士之後塵者，續研鄭氏之《尚書》學、《春秋》學，使鄭氏之經學無不大明，豈非學苑之盛事也哉？至許氏以「五經無雙」著稱於世，有清一代擅研其《說文》之學者二百餘家，可謂極盛，而擅研其《五經》之學者寥若晨星，寧非憾事？是則有望於後之博士矣。⁷⁹

指導博士生從事鄭玄經學研究的構想，後來在政大繼續獲得實踐，他和熊公哲聯合指導呂凱撰寫《鄭玄之讖緯學》，呂凱以此文於民國六十三年獲得國家文學博士。又指導李威熊研究鄭玄的老師馬融(79-166)，李威熊於民國六十四年以《馬融之經學》獲得國家文學博士；指導李振興研究鄭玄的反對者王肅(195-256)，李振興亦於民國六十五年以《王肅之經學》獲得國家文學博士。但他的經學規畫並非只停留在「許、鄭之經學大明」的階段，在他的指導下：

學者更緣以上探先秦、兩漢之經學，如胡生自逢撰《先秦諸子易說通考》、許生鈇輝撰《先秦典籍引尚書考》、徐生芹庭撰《兩漢十六家易注闡微》，賴生炎元撰《韓詩外傳考微》；又沿以下探魏、晉、南北朝之經學，如黃生慶萱撰《魏晉南北朝易學書考佚》、王生熙元撰《穀梁范注發微》；更有直探諸經之內容者，如黎生建震撰《尚書周書考釋》、賴生明德撰《毛詩考釋》、周生何撰《春秋吉禮考辨》、王生關仕撰《儀禮漢簡本考證》、《儀禮服飾考辨》；不以許、鄭之經學為限。蓋博通後儒之經學，即所以明經；明經，則孔子之道亦明也。⁸⁰

高明雖只指導了十位政大從事經學研究的碩博士生，不過若以整個臺灣經學教育的角度來看，高明總共指導了經學領域的碩博士生三十九位，再將與經學關係較密切的小學領域加進來的話，則數目更加驚人。誠如林慶彰先生所說的：

如以對後來臺灣研究經學的影響來說，以屈萬里、高明兩位最為重要。當時屈萬里先生在臺灣大學任教，後來他的弟子除在臺灣大學外，分布在中央研究院、東吳大學等。高明先生本在省立師範學院（今臺灣師範大學）任教，

⁷⁹ 高明：〈周易鄭氏學序〉，同前註，頁197-198。

⁸⁰ 高明：〈尚書鄭氏學序〉，同前註，頁203-204。

後來創立政治大學中研所，他的弟子除在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外，分布全臺灣各大專院校，這些弟子把老師種下的經學幼苗，灌溉成綠蔭濃密的大樹。⁸¹

就政大的角度，則或許應這樣看：以熊公哲、高明和王夢鷗為骨幹的第一代學人所培育的經學人才，日後皆茁壯成了經學領域的第二代學人，不只擔任在政大繼續傳授經學的主力，而且也撐開了臺灣經學研究、教育與傳播的一大片天空。

六、結 論

本文利用《國立政治大學概況》所載之課程科目資料，以及《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明》中的經學課程之講授綱要，再輔以其他相關校史系史、論文指導和學人文集書信等資料，試圖呈現以第一代學人為主體的政大在臺復校肇始階段時期的經學教育風貌。但關於早期的原始課程及人事資料，在掌握和利用上皆仍有缺憾不足之處。或因原始檔案不復存於天壤，或仍有蒐羅未盡未全者。總之，離「復原」、「重建」當時整體經學教育的階段仍還很遙遠。此外，其他與經學相關之討論，如政大中文系經學研究的成果和產出，以及創系三先生與經學相關之社會參與和實踐，如教科書編撰、古籍今註今譯、經學推廣等……，亦因篇幅限制，只能暫時從闕。

然而經過這一番巡禮後，卻也不免引發某些值得進一步反思的問題，首先，究竟要如何看待或評估政大經學教育與戰後臺灣整體經學學風和環境之型塑？從政大本身的情況來看，這數十年來的經學教育的成效，又該如何客觀公允地評價？此外，經學教育（連同小學）是否形成了一足夠標識的學風特色？而這樣的學風（如果有的話），究竟對經學的推廣和發揚，是扮演了正面的推進功能，或是負面的阻礙作用？面對中文學界整體的大趨勢，從經學、小學的盛極一時，到後來逐漸讓位於文學、義理的研究⁸²，這樣的趨勢轉變代表的意義為何？……這些皆是不易解答，

⁸¹ 林慶彰：〈序〉，《五十年來的經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3年），頁IV。

⁸² 龔鵬程曾在民國73年發表過一篇大鬧天宮式的論文：〈中華民國國家文學博士論文內容與方法的評析〉，文中統計，在民國50年至72年的23年間，文學類論文從50年間占論文總數的19%，至60年間占論文總數的30%，再至70年間占總數的46%，上升趨勢極明顯。反觀經學類論文則由同期的44%，降至23%，再跌至10%，形成一極大的反差。龔鵬程針對經學沒落的趨勢提出如

然而卻是吾人今日關心經學教育者所不得不正視的問題。

其次，由第一代學人於六十年前在指南山下所建立的經師之業，經數十年來的持續傳授流布，已開枝散葉傳至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四代的學人。從以往學派的角度來思考，不免令人好奇，是否有所謂的「指南經學」成立的可能？因而亦有「指南學案」書寫的可能？不過，即使用一種較寬泛鬆散的標準來看待所謂「指南經學」的概念，其實際表現和具體內涵，也不大能夠用古代學派和學案的觀念來衡量。蓋因現代的學風和學術流變的情況，和古代的環境有極大的不同，第一代學人的治學方式和學風特色，不一定會全同於第二、三代，而不同世代的學人亦會展現出有別於其他世代的獨特治學風格與學術品味。因而，如何用一種動態發展的眼光，來看待這數十年來的政大經學之表現，且又盡可能不失其整體一貫之特色與風格，此誠為今日思考指南經學之相關課題時所當深思熟慮者。

此的觀察和建言：「經學方面，可能是因為較需要深厚的功力，雖然許多中文研究所都曾規定必須圈點十三經四史才能卒業，研究意願和能力卻逐漸滑失……回應之道，不在加強磨鍊，而在解除束縛，取消經書圈點制度，是培養自由探究意願的第一步，只有在自由抉擇與發展研究興趣、能力的情況下，經學研究才能恢復生機，講授群經大義之類課程，才不會被視為學習的負擔。」但當時擔任臺師大國文研究所所長的黃錦鉉(1922-2012)卻認為圈讀經書的立意是好的，對聰明的學生是拘束，但對一般學生來說，就能使其按部就班的長進（以上均見龔鵬程：《我們都是稻草人》〔臺北：久大文化公司，1987年〕，頁124、142）。又參龔鵬程：〈年輕一代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經典與現代生活》，頁190。龔文只提及文學，義理為本人所加。

附錄：熊公哲、高明與王夢鷗指導碩博士生學位 論文一覽表

一、熊公哲（共 32 位，與經學有關者計 13 位，與政大經學有關者計 10 位）

（一）碩士論文：（共 22 位，與經學有關者計 7 位，與政大經學有關者計 6 位）

	姓名	論文題目	畢業學校	畢業 年分	共同 指導	附註
1	朱守亮	列子辨偽	臺灣師範大學	1961		
2	周虎林	荀子學術淵源及其流衍	臺灣師範大學	1963		
3	羅宗濤	韓非思想源於老子說	臺灣師範大學	1963		
4	何希淳	禮記正義引佚書考	臺灣師範大學	1964		經學
5	周榮村	朱子學術思想淵源	政治大學	1966		
6	席涵靜	周代史官考	政治大學	1966		
7	儲砥中	韓柳文比較研究	政治大學	1966		
8	卓忠信	論語何氏集解朱子集注 比較研究	政治大學	1967		經學
9	黃俊郎	子游學案	政治大學	1968		經學
10	葉程義	禮記正義引書考	政治大學	1969		經學
11	陳宗賢	李太白詩述評	臺灣師範大學	1970		
12	王義雄	法家思想溯源	臺灣師範大學	1970		
13	黃景進	北宋四子修養方法論	政治大學	1971		
14	許春雄	李二曲研究	政治大學	1971		
15	陳美利	朱子詩集傳釋例	政治大學	1972		經學
16	藍秀隆	揚子法言研究	政治大學	1972		
17	謝朝清	莊子天下篇疏證	臺灣師範大學	1972		
18	程南洲	經傳釋詞辨例	政治大學	1973		經學、小學
19	董金裕	章實齋學記	政治大學	1973		
20	楊志祥	管子富強政策之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73		
21	施炳華	毛傳釋例	政治大學	1974		經學、小學
22	徐平章	王符潛夫論研究	政治大學	1974		

(二) 博士論文：(共 10 位，與經學有關者計 6 位，與政大經學有關者計 4 位)

	姓名	論文題目	畢業學校	畢業年分	共同指導	附註
1	陳品卿	尚書鄭氏學	臺灣師範大學	1973	高明、林尹	經學
2	呂凱	鄭玄之讖緯學	政治大學	1974	高明	經學
3	李威熊	馬融之經學	政治大學	1975	高明	經學
4	李振興	王肅之經學	政治大學	1976	高明	經學
5	董金裕	宋永嘉學派之學術思想	政治大學	1977	高明	
6	程南洲	東漢時代之春秋左氏學	政治大學	1978	高明	經學
7	李豐楙	魏晉南北朝文士與道教之關係	政治大學	1978	羅宗濤	
8	權重達	資治通鑑對中韓學術之影響	政治大學	1979	高明、方豪	
9	顏天佑	元雜劇所反映之元代社會	政治大學	1980	葉慶炳	
10	簡博賢	今存三國兩晉經學遺籍考	臺灣師範大學	1980	楊家駱	經學

二、高明(共 118 位，與經學有關者計 39 位，與政大經學有關者計 11 位)

(一) 碩士論文：(共 47 位，與經學有關者計 13 位，與政大經學有關者計 4 位)

	姓名	論文題目	畢業學校	畢業年分	共同指導	附註
1	王忠林	周易正義引書考	臺灣師範大學	1958		經學
2	賴炎元	毛詩鄭氏箋釋例	臺灣師範大學	1958		經學
3	蒙傳銘	尹文子考	臺灣師範大學	1959		
4	李雲光	曾子學案	臺灣師範大學	1959		經學
5	邱燮友	古文運動史略	臺灣師範大學	1959		
6	祁懷美	花間集之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59		
7	邱鎮京	敦煌變文研究	文化大學	1965		
8	吳德風	鮑照生平及其作品校正	政治大學	1966		
9	王更生	晏子春秋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66		
10	李金城	樂府詩集漢魏相和歌辭校注	臺灣師範大學	1966		
11	王關仕	儀禮漢簡本考證	臺灣師範大學	1966		經學
12	吳銘遠	東漢王充天人思想的研究	文化大學 哲學研究所	1966		
13	康榮吉	陸機及其詩	政治大學	1967		
14	王初蓉	淮海詞研究	政治大學	1967		

	姓名	論文題目	畢業學校	畢業 年分	共同 指導	附註
15	李栖	漱玉詞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67		
16	蔡主賓	敦煌寫本儒家經籍異文考	政治大學	1968		經學、小學
17	陳飛龍	說文無聲字考	政治大學	1968		小學
18	曾勤良	二徐說文會意形聲字考異	輔仁大學	1968		小學
19	張秉鐸	張之洞評傳	文化大學	1968		
20	李三榮	閩南語十五音之研究	政治大學	1969		小學
21	林素珍	廣韻又音研究	政治大學	1969		小學
22	丁履誤	文選李善注引詩考	臺灣師範大學	1969		經學
23	尹定國	說文所存古史考	輔仁大學	1969		小學
24	謝素行	陳振孫及其直齋書錄解題	文化大學	1969		
25	方俊吉	廣雅疏證釋例	政治大學	1970		經學、小學
26	簡宗梧	經典釋文徐邈音之研究	政治大學	1970		經學、小學
27	陳光政	梁僧寶之等韻學	政治大學	1970		小學
28	邱衍文	冠禮研究	文化大學	1970		經學
29	陳煥芝	玄應一切經音義引說文考	文化大學	1970		小學
30	王初慶	說文草木疏	輔仁大學	1970		小學
31	徐傳雄	唐人類書引說文考	輔仁大學	1969		小學
32	洪固	經史正音切韻指南之研究	輔仁大學	1970		小學
33	陳光憲	慧琳一切經音義引說文考	文化大學	1970		小學
34	侯秋東	王弼易學之研究（周易略例疏證）	政治大學	1971		經學
35	李威熊	經典釋文引說文攷	政治大學	1971		經學、小學
36	柯金虎	大廣益會玉篇引說文考	政治大學	1971		小學
37	陳玲琇	樂記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71		經學
38	勤炳琅	水經注引書考	臺灣師範大學	1971		
39	曾昭旭	曲園學記	臺灣師範大學	1971		經學、小學
40	李振興	說文地理圖攷	政治大學	1972		小學
41	林平和	呂靜韵集研究	政治大學	1972		小學
42	董忠司	曹憲博雅音之研究	政治大學	1973		小學
43	黃桂蘭	集韻引說文考	政治大學	1973		小學
44	鮑國順	段玉裁校改說文之研究	政治大學	1974		小學

	姓名	論文題目	畢業學校	畢業年分	共同指導	附註
45	施人豪	鄭樵文字說之商榷	政治大學	1974		小學
46	唐明敏	李白及其詩之版本	政治大學	1975		
47	廖雪蘭	評述花間集暨其十八作家	文化大學	1978		

(二) 博士論文：(共 71 位，與經學有關者計 26 位，與政大經學有關者計 7 位)

	姓名	論文題目	畢業學校	畢業年分	共同指導	附註
1	賴炎元	韓詩外傳考徵	臺灣師範大學	1962	林尹、程發軔	經學
2	王忠林	中國文學之聲律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62	林尹、程發軔	
3	李雲光	三禮鄭氏學發凡	臺灣師範大學	1964	孔德成、林尹	經學
4	胡自逢	周易鄭氏學	臺灣師範大學	1966	林尹、程發軔	經學
5	周何	春秋吉禮考辨	臺灣師範大學	1967	林尹、程發軔	經學
6	陳新雄	古音學發微	臺灣師範大學	1969	林尹、許世瑛	小學
7	成元慶	十五世紀韓國字音與中國聲韻之關係	臺灣師範大學	1969	林尹、許世瑛	小學
8	許世旭	中韓詩話淵源考	臺灣師範大學	1970	林尹、李漁叔	
9	于大成	淮南子校訂	臺灣師範大學	1970	林尹、王叔岷	
10	王熙元	穀梁范注發微	臺灣師範大學	1970	林尹	經學
11	許鏐輝	先秦典籍引尚書考	臺灣師範大學	1970	林尹	經學
12	黃永武	許慎之經學	臺灣師範大學	1970	林尹	經學
13	阮廷焯	先秦諸子考佚	臺灣師範大學	1970	林尹	
14	應裕康	清代韻圖之研究	政治大學	1972	林尹	小學
15	羅宗濤	敦煌講經變文研究	政治大學	1972	王夢鷗	
16	王更生	籀廬學記	臺灣師範大學	1972	林尹	經學
17	黃慶萱	魏晉南北朝易學考佚	臺灣師範大學	1972	林尹	經學
18	賴明德	毛詩考釋	臺灣師範大學	1972	林尹、魯實先	經學
19	辛勉	古代藏語和中古漢語語音系統的比較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72	歐陽鶯、林尹	小學
20	左松超	說苑集證	臺灣師範大學	1972	林尹	
21	婁良樂	管子評議	臺灣師範大學	1973	林尹	
22	徐芹庭	兩漢十六家易注闡微	臺灣師範大學	1973	陳立夫、林尹	經學
23	陳品卿	尚書鄭氏學	臺灣師範大學	1973	熊公哲、林尹	經學
24	王關仕	儀禮服飾考辨	臺灣師範大學	1973	林尹	經學
25	呂凱	鄭玄之讖緯學	政治大學	1974	熊公哲	經學

	姓名	論文題目	畢業學校	畢業 年分	共同指導	附註
26	陳飛龍	龍龕手鑑研究	政治大學	1974	林尹	小學
27	黎建寰	尚書周書考釋	臺灣師範大學	1974	林尹、魯實先	經學
28	陳泰夏	雞林類事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74	林尹	
29	邱榮錫	集韻研究	文化大學	1974	林尹	小學
30	李威熊	馬融之經學	政治大學	1975	熊公哲	經學
31	林平和	明代等韻學之研究	政治大學	1975	林尹	小學
32	謝海平	唐代蕃胡生活及其對文化的影響	政治大學	1975	王夢鷗、方豪	
33	蔡信發	新序疏證	臺灣師範大學	1975	林尹	
34	李振興	王肅之經學	政治大學	1976	熊公哲	經學
35	簡宗梧	司馬相如揚雄及其賦之研究	政治大學	1976	盧元駿	
36	黃志民	王世貞研究	政治大學	1976	王夢鷗	
37	杜松柏	禪學與唐宋詩學	臺灣師範大學	1976	林尹	
38	董金裕	宋永嘉學派之學術思想	政治大學	1977	熊公哲	
39	宋昌基	中國古代女性倫理觀：以先秦兩漢為中心	政治大學	1977	王夢鷗	
40	曾昭旭	王船山及其學術	臺灣師範大學	1977	林尹	
41	程南洲	東漢時代之春秋左氏學	政治大學	1978	熊公哲	經學
42	鮑國順	戴東原學記	政治大學	1978	林尹	與經學有關
43	董忠司	顏師古所作音切之研究	政治大學	1978		小學
44	胡玄明	中國文學與越南李朝文學之研究	政治大學	1978	陳立夫、華仲慶	
45	張文彬	高郵王氏父子學記	臺灣師範大學	1978	林尹	經學、小學
46	田鳳臺	呂氏春秋研究	政治大學	1979	胡自逢	
47	權重達	資治通鑑對中韓學術之影響	政治大學	1979	熊公哲、方豪	
48	龔顯宗	明七子派詩文及其論評之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79	林尹、汪中	
49	葉政欣	賈逵春秋左傳遺說探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79	林尹	經學
50	李周龍	揚雄學案	臺灣師範大學	1979	李鑒	
51	邱衍文	唐開元禮中喪禮之研究	文化大學	1979	林尹	與經學有關
52	鄭明嫻	西遊記探源	臺灣師範大學	1980	羅宗濤	
53	莊雅州	夏小正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81	周何	經學

	姓名	論文題目	畢業學校	畢業 年分	共同指導	附註
54	沈秋雄	三國兩晉南北朝春秋左傳學佚書考	臺灣師範大學	1981	周何	經學
55	徐信義	碧雞漫志校箋	臺灣師範大學	1981	鄭騫	
56	張夢機	詞律探原	臺灣師範大學	1981	鄭騫	
57	朱榮智	元代文學批評之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81	李鑒	
58	陳慶煌	劉申叔先生之經學	政治大學	1982	成惕軒	經學
59	陳麗桂	淮南鴻烈思想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83	于大成	
60	洪淳孝	三國演義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83	王靜芝	
61	譚明皋	民生史觀文學理論之研究	文化大學	1983	林尹	
62	柯金虎	魏晉南北朝禮學書考佚	政治大學	1984	周何	經學
63	趙鍾業	唐宋詩話對韓日影響比較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84		
64	崔完植	王陽明詩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84	李鑒	
65	韋金滿	柳蘇周三家詞〔聲律與修辭〕之比較研究	香港新亞研究所文學組	1986		
66	安秉高	中國寓言傳記研究	政治大學	1987	呂凱	
67	葉程義	漢魏石刻文學研究	東吳大學	1987		
68	徐漢昌	管子思想之綜合研究	政治大學	1988	呂凱	
69	陳維德	孔墨思想異同之研究	政治大學	1991	呂凱	
70	曹愉生	唐代詩論與畫論之關係研究——僅以詩論與畫論之專著為研究對象	政治大學	1991	呂凱	
71	朴宗喆	王安石詞研究	東吳大學	1991		

三、王夢鷗（共 40 位，與經學有關者計 1 位，與政大經學有關者計 1 位）

（一）碩士論文：（共 22 位，與經學有關者計 0 位，與政大經學有關者計 0 位）

	姓名	論文題目	畢業學校	畢業 年分	共同 指導	附註
1	許德平	金樓子校注	政治大學	1967		
2	趙英規	明代小說對李朝小說之影響：以剪燈新話、三言、三國志演義為中心	政治大學	1967		
3	成宜濟	孽海花研究	政治大學	1967		
4	吳哲夫	清代禁燬書目研究	政治大學	1968		
5	葉日光	詩人潘岳及其作品校注	政治大學	1968		
6	謝海平	講史性之變文研究	政治大學	1970		
7	陳錦釗	李贄之文論	政治大學	1971		

	姓名	論文題目	畢業學校	畢業 年分	共同 指導	附註
8	周次吉	六朝志怪小說研究	政治大學	1971		
9	康百世	金聖嘆評改水滸傳的研究	政治大學	1971		
10	禹政夏	韓國小說洪吉童傳之作者 及其受中國小說影響之研究	政治大學	1971		
11	黃志民	明人詩社之研究	政治大學	1972		
12	蔡營源	徐渭之生平及其文學觀	政治大學	1972		
13	申美子	中國唐代婦女生活研究	政治大學	1973		
14	胡萬川	馮夢龍生平及其對小說之貢獻	政治大學	1973		
15	任日鎬	李朝中國語言教學之研究	政治大學	1973		
16	鄭靖時	王若虛及其詩文論	政治大學	1974		
17	盧錦堂	紀昀生平及其閱微草堂筆記	政治大學	1974		
18	劉漢初	蕭統兄弟的文學集團	臺灣大學	1975		
19	歐陽炯	楊萬里及其詩學	東吳大學	1981		
20	俞炳甲	唐人小說的寫作技巧研究	輔仁大學	1985		
21	洪在玄	李賀的文學世界研究	輔仁大學	1985		
22	陳昭昭	從戲劇小說看關公形象嬗變	輔仁大學	1986		

(二) 博士論文：(共 18 位，與經學有關者計 1 位，與政大經學有關者計 1 位)

	姓名	論文題目	畢業學校	畢業 年分	共同指導	附註
1	羅宗濤	敦煌講經變文研究	政治大學	1972	高明	
2	謝海平	唐代蕃胡生活及其對文化的 影響	政治大學	1975	高明、方豪	
3	詹秀惠	南北朝著譯書四種語法研究	臺灣大學	1975	屈萬里	
4	黃志民	王世貞研究提要	政治大學	1976	高明	
5	宋昌基	中國古代女性倫理觀：以先 秦兩漢為中心	政治大學	1977	高明	
6	陳錦釗	子弟書之題材來源及其綜合 研究	政治大學	1977	盧元駿	
7	陳萬益	晚明性靈文學思想研究	臺灣大學	1977	張敬	
8	沈謙	文心雕龍之文學理論與批評	臺灣師範大學	1980	李辰冬	
9	周行之	中共的「革命文學」	臺灣師範大學	1980	郭乾輝	
10	盧錦堂	太平廣記引書考	政治大學	1981	羅宗濤	

	姓名	論文題目	畢業學校	畢業年分	共同指導	附註
11	鄭亞薇	南宋江湖詩派之研究	政治大學	1981	羅宗濤	
12	鍾慧玲	清代女詩人研究	政治大學	1981	羅宗濤	
13	崔奉源	中國古典短篇俠義小說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	1983	吳宏一	
14	周全	宋遺民志節與文學之研究	東吳大學	1983		
15	李時銘	馬驢之生平與學術	政治大學	1984	羅宗濤	與經學有關
16	高大鵬	唐詩演變之研究：唐詩近代化特質形成初探	政治大學	1985	羅宗濤	
17	林明德	梁啟超與晚清文學運動	政治大學	1989		
18	俞炳甲	唐人小說所表現之倫理思想研究：以儒家為中心	政治大學	1993		